

新編魏徵集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

呂效祖

馬生編
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

僕臣正

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士也、

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言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諛

諛、則其君乃自謂聖、

后德惟臣、弗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無德、

惟臣諛之、言君所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

官油



興、汝無親近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

官道

王曰、嗚呼、伯父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



朕言、皆王同姓、有父兄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吕效祖 主编

新编魏征集

三秦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6 号

新编魏征集

吕效祖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 12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北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69 印张 2 插页 1162 千字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ISBN 7-80546-497-9/K · 162

定价: 58.00 元



清宫南熏殿旧藏魏征像

天六之事有善
乃惡任善人則
國安任惡人則
國亂

以上魏正清為新編魏正清集題

一九九三年秋 符浩





魏征墓远景

(陈宝刚摄)

墓，当地群众世代相传，呼称“魏陵”。在陕西礼泉九嵎山唐昭陵西南约3公里处的凤凰山巅。墓于山岭南端依山凿石而筑，高大雄伟，属昭陵陪葬墓之一。

以史为鉴（代序）

白清才

历史有它的承继性和借鉴作用。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不应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军事家、文学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魏征是我国初唐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数十万字的谏言、疏文、史论和《群书治要》等论著，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

魏征是我国唐代“贞观之治”时期的著名谏官。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的事迹，千百年来，一直传为佳话。他对“贞观之治”的贡献，历来为中外史家所称赞。他崇高的道德品质，高瞻远瞩的政治见解，被历代奉为圭臬。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领袖，也曾对魏征作过很高的评价。1937年，毛泽东同志在他著名哲学论文《矛盾论》中写道：“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1962年，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福建组会上讲话时指出：“要提倡讲真话，即使是讲过了火的也要听。唐朝皇帝李世民，能听魏征的反对意见，‘兼听则明’，把唐朝搞得兴盛起来。他们是君臣关系，还能做到这样，我们是同志关系，就更应该能听真话了。”从此，魏征谏言和他一系列著名论断，便赋予了时代的新意，闪烁着中华民族传统优秀历史文化的光辉。

《新编魏征集》，不仅继承和弘扬了我们伟大中华民族灿烂的

古代文化，而且对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提出坚决惩治腐败，端正党风，加强廉政建设，无疑是一面很好的历史镜子。我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同志，能够认真地读一读这本书，以史为鉴，总结历史经验，就不难洞察出国家兴衰的征兆和个人工作的得失。同时，我们还可从这本书中看出魏征廉洁奉公，节操自爱，力主反腐败，严惩污吏，刚直不阿，直言敢谏的高尚品质，永远受到人们的敬重。我更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去整理研究我国传统优秀的历史文化典籍，撰写出更多更好的这方面的论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自己的才华。

1993年9月

绪 论

吕效祖

魏征(580—643)是我国初唐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他写给唐太宗李世民数十万字的谏言、疏文、史论和由他主编的《群书治要》等,是我们中华民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

“知人善任”和“选贤任能”是魏征辅佐唐太宗时期进谏的指导思想。因为他深知,国家官吏素质的好坏,是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安危的关键所在。正如他在谏言中一再强调的那样:“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任恶人则国乱。”因此,他曾不厌其烦地向唐太宗进谏,要把忠正、贤良、廉洁奉公、才华出众的人才选拔到各级领导位置上来。但是,理论上说起来容易,实际上真正能区别出君子与小人、忠良与奸诈、善人与恶人的界限,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每个人的出身历史、所处环境和所受教育的不同,因此形成的思想观点、知识才能、道德观念各有所异。譬如,有的擅文,有的长武,有的有德无才,有的有才无德,有的能言善辩,有的少言寡语,不善于自我表现,尤其是有的人形于内而不形于外,“大智若愚”,“大奸似忠”。如果择官用人时,被他们的表面现象所蒙蔽,就不可能弃恶取善,选贤任能。为此,魏征在贞观十四年向唐太宗进谏时陈述了他对“御臣之术”的总原则。他认为:现在的群臣中,品德高洁、才能卓越的人是很少的,这是由于朝廷对他们要求不严,表彰奖励还不够精细的原故。如果“勸之以公忠,期之以远大”,即就是说,用大公无私、忠心为国来勉励他们,用远大理想来要求他们,使他们职责分明,就能引导他们“得行其道”,做出自己的贡献。

魏征与唐太宗在政治上有密切关系。他辅佐唐太宗十七年(627—643),

是唐太宗统治集团的主要策划人物和决策人物之一。魏征的谏言、疏文、史论和他主编的《群书治要》等不仅反映了唐初以魏征为代表的一批谏官、元臣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因此,在这里特别应当肯定的是:魏征的谏言和他编著的所有史论文章,以及作为他的谏言、疏文理论依据的《群书治要》的最大功绩,是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史上,由唯心史观转折到带有一定朴素的唯物史观的作用。如对唐以前古籍文献中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历代帝王无不自称是“授命于天”的“天子”),而魏征在他的论著中则对此表示明确的否定态度,而反复阐述“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研究魏征谏言和他编撰的《群书治要》等所提出的一些主张、观点和理论,对于揭示唐朝统治集团,特别是唐初统治集团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以及唐太宗这位气度恢宏、风云一时的帝王,如何由虚心纳谏而取得统治成功,又因成功而骄傲乃致拒谏的历史教训,是不无益处的。

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是和唐太宗能够虚心求谏分不开的。如无魏征这样直言不讳的谏臣,唐太宗也是不可能实现纳谏的;反之,如无唐太宗的思想开明,也绝容不得与魏征这样人物的朝夕共处。唐太宗与魏征“上下同心”的君臣关系,不是什么“千载一合”(《贞观政要》卷六)的相遇,而是由他们的共同政治生活的实践活动所决定。他们在我国古代史上之所以能被历代史家赞誉为封建社会君明臣直的楷模,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这就是唐太宗与魏征都曾经亲眼看见过隋封建王朝的富足与强盛;曾经亲眼看见过隋炀帝是怎样地拚命榨挤民力,从事于“离宫别馆”的修建,“以肆行幸行”(《贞观政要》卷十);曾经亲眼看见过隋炀帝的贪婪欲望,是何等的强烈,尽管“美女珍玩,无院不满”,仍然“征求无已”(《贞观政要》卷一);曾经亲眼看见过隋炀帝是怎样地拚命使用暴力,“东征西讨,穷兵黩武”(《贞观政要》卷一),疯狂地向周围各部落、部族用兵,以满足其掠夺扩张的欲望。当“民不堪命”,进行猛烈反抗的时候,“以四海之尊”的隋炀帝,竟“殒于匹夫之手”(《贞观政要》卷一),被埋葬在农民起义的洪流中。一些恶贯满盈的贵族、官僚、豪族分子也随之葬身于这个如火如荼的斗争中去。在这样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血的教训表明:要巩固自己已经夺取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人民群众。不然,就会像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隋炀帝一样,也难逃杀身亡国的后果。对这一点的认识,唐太宗与魏征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以隋为鉴”,并定有“论隋日”,重视历史经验,这在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还

是罕见的。由于他们经常以隋亡为戒，采取了一系列对农民让步的政策，比较成功地促进了饱受隋末战乱创伤的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

魏征是封建王朝的大臣，他为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那种“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贵，中不侈亲戚，外不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旧唐书·魏征传》）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时至今日，他的言论思想对我们仍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

《新编魏征集》由《魏征谏言》、《魏郑公文集》、《魏郑公诗集》、《魏郑公谏录》、《魏郑公谏续录》、《魏征史论录》、魏征主编的《群书治要》等七部分汇编而成。

魏征一生著作多得惊人。据唐史记载有：《魏征集》二十卷、《时务策》五卷、《谏事》五卷、《隋书列传》一卷、《类礼》二十卷、《祥瑞录》十卷、《祥应图》十卷、《励忠节》四卷、《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二卷、《周易义》六卷。此外，经他主编的著作有《梁史》五十六卷、《陈史》三十六卷、《周史》五十卷、《齐史》五十卷、《隋史》五十五卷、《群书治要》五十卷、《大唐仪礼》一百卷、《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唐亡后，可惜魏征大部分著作均已失散，传留至今的仅有《文集》、《群书治要》（这部书唐时日本遣唐使带到日本，我国现存的版本是清乾隆时期，由日本反馈回国的）和《隋史》等几部历史著作了。所以我原计划编纂《魏征全书》，事实已成为不可能。后来书名就决定改为《新编魏征集》。

《群书治要》在唐朝灭亡后，即已在国内失传。据日本岛田翰著的《古文旧书考》称：“《续日本后记》：‘仁明天皇承和五年（当唐代开成三年，公元838年），天皇御清凉殿，令助教（日本官名）直道宿称广公读《群书治要》。’日本《三代实录》云：‘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贞观是日本第五十六代天皇年号，相当唐乾符二年，即公元875年）四月，天皇读《群书治要》。’由此可知，《群书治要》在唐文宗时已传入日本，而且文宗、僖宗时日本仁明天皇与清和天皇，还均与大臣共研读之。日本嘉元（日本九十四代天皇年号）四年（相当元大德九年，即公元1305年）二月十八日‘以右大办（日本官名）三位经雄卿本书写点校毕（指《群书治要》）’。到了日本元和（第一〇八代天皇年号）时代（1615—1623）即明万历四十三年—明天启三年）日本用活字版刊印《群书治要》。这个版本我国仅有一本，现存台湾。北京图书馆仅存这部书的微缩胶卷。我们这次作为底本整理的是由我国近代著名出版家张元际依

据日本天明七年（清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刊印的缩印本。全书五十卷。日本元和版与天明版均缺第四卷《春秋左传·上》、第十三卷《汉书·一》、第二十卷《汉书·八》。因此，我们目录仍照旧为五十卷，而实际只有四十七卷，包括六十六种书。《群书治要》保存了中国很多久已失传的古籍，如《晋书》二卷，尚为唐代以前十八家《晋史》的旧本史料。又如桓谭《新论》、崔寔《政要论》、仲长统《昌言》、袁准《正书》、蒋济《万机论》、桓范《政要论》等，藉此以存其梗概，颇为珍贵。

《魏郑公文集》（魏征被封为郑国公，故称魏郑公）是清末王灏主编的《畿辅丛书》之一。共辑录魏征二十四篇文章，它与董诰编纂的《全唐文》所录魏征文卷数篇章内容相同。纵观魏征文章，可以看出唐初这位著名政治家的才能，头脑清醒，坚持原则，不与邪恶同流合污，敢于说出一般人不敢说的话，高瞻远瞩，安不忘危，理不忘乱；才智出众，精力充沛，勤奋工作，自觉为唐王朝服务的精神。可贵的《文集》保留有魏征在青年时期当道士时的感慨怀才不遇的作品《道观内柏树赋》，以及后来他投笔从戎加入隋末农民起义军的行列，代李密写给隋荥阳太守杨庆的劝降书。李密被唐将杀害后，他大胆为李密作的《墓志铭》，慷慨激昂，意气纵横，不仅反映魏征惊心动魄而又十分崎岖复杂的生活道路，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研究隋末农民起义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魏征文章富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文章材料由于来之于实践，语言生动，文词简练，在文学上也取得较高的成就。

《魏郑公诗集》一卷，也是《畿辅丛书》之一。共辑录魏征诗三十四首。它与清初彭定求等编纂的《全唐诗》所录魏征诗篇章内容相同。纵观魏征诗，绝大部分是郊祀乐章和奉和应诏之作，内容多属赞颂“贞观之治”和歌颂唐太宗。诗内容表现了革新政治的精神，不是一般诗人一时的狂言大语，而多是有现实事实依据的诗作。尤其是《述怀》（一作《出关》）、《暮秋言怀》、《赋西汉》等三首诗，诗笔简劲，扫去浮华，字里行间贯注了作者慷慨之气，不同陈、隋、唐初的柔靡格调，在陈子昂之前透露了五言古体诗向浑健精实转变的气息。

《魏郑公谏录》，全书五卷。唐王方庆撰。方庆，武周时宰相。《四库全书总目》在《魏郑公谏录》条目中称：“《唐书·王方庆传》没有记载，可能史文脱落之故。本传称：‘方庆博学谏朝政，著书二百余篇。’此乃所录魏征事迹，《唐书·艺文志》以为《魏征谏事》。司马光《通鉴书目》以为《魏元成故事》，标题互异。惟洪迈《容斋随笔》作《魏郑公谏录》，与此相合。方庆

在武周时，尝以言悟主，召还庐陵。后谏言不斥太子名，以示复位之渐，皆人所难能。盖亦思以亢直自见者，故于征谏诤之语，摭录最详。司马光《通鉴》所记征事，多以是书为依据，其未经采录者，亦皆确实可信，足与正史相参证。”

《魏郑公谏续录》，全书二卷。元翟思忠编撰。其书刻于元统（元惠宗年号）中，明初已罕流传，故彭年搜采遗文为《续录》一篇，以补其缺。此本载《永乐大典》中，缀王琳所作《谏录》之后，篇数即翟思忠所续本也，王琳所辑《谏录》，仅据其所见闻，未能赅备。《唐书·魏征传》云：“前后二百余奏，无不剴切当帝心者。”已不尽传，其他片语单词，随时献纳者，更为史所不尽纪。此本虽摭拾众说，与史传间有异同，且有实非谏诤之事，而泛滥入之录中者，然大旨明白切要，于治道颇有补，要非其他小说杂记比也。

《魏征史论录》，是笔者从《隋书》、《北齐书》、《梁书》、《陈书》等史书中有关魏征撰写的《序》、《总论》辑录成书的。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再版《辞海》魏征词条记述：“著作有《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另据李宗邺教授考证《隋书·经籍志》亦为魏征所撰，其书在我国目录学上，实有创始的指导作用。它把中国的历史典籍，区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这种分类法一直沿用到近代未变。史部又分为正史、古史、旧事、职官、仪注、刑法、霸史、杂传、地理、谱系、簿录、杂史、起居注等十三小类，这种分类法影响了后来的史籍分类。并且详细地记录唐朝以前典籍一万四千四百六十六部，合有八万九千六百六十六卷，总结了古代典籍的数量，叙述了古代典籍的思想性质，给后来一切史书《艺文志》及目录学以很好的范例。《史论录》的内容，除北齐八帝总论、梁四帝总论、隋五帝总论、陈后妃总论。其中评隋文帝、隋炀帝，总结隋朝亡国的教训，颇有见地，成为魏征向唐太宗进谏时借鉴历史的主要理论依据。

《魏征谏言》取材于唐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魏征等与唐太宗论政之语）。吴兢编撰《贞观政要》的目的在于：既能歌颂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德政与治术，也能用以告诫李唐的后继人，即所谓“惩劝人伦”、“克遵前轨”，以期唐王朝的永久统治。因此，唐朝后来的统治者非常重视这部著作，被列为宫廷皇子皇孙的必读书籍。唐以后，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很推崇这部著作。宋仁宗就非常欣赏唐太宗任人的“德行学业为本”的宗旨。元朝皇帝多次请当代有名儒臣讲解这部书的内容。明朝皇帝还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日中午均要请侍臣教授《贞观政要》。清康熙、乾隆皇帝都很熟悉

《贞观政要》的内容，十分仰慕“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一书，在国外也颇有影响。约在9世纪前后就传到了朝鲜、日本等国，特别在日本引起封建统治者的注意。他们仿效中国，也把《贞观政要》定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科书。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在1615年颁布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十七条中，就规定天子必读《贞观政要》，以“明古道”。此后，《贞观政要》在日本得到了广泛流传，近几年，甚至被誉为“帝王学”、“领导的艺术”。

总之，编纂《新编魏征集》旨在借鉴古人经验，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振奋民族精神，促进改革开放，以期加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正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编辑例言

1. 《新编魏征集》除收入前代已有的《魏郑公文集》、《魏郑公诗集》、《魏郑公谏录》、《魏郑公谏续录》、《群书治要》等书之外，还包括根据《贞观政要》整理而成的“魏征谏言”，以及根据《隋书》、《陈书》、《梁书》整理的“魏征史论”。全书最后附有魏征年表。

2. 原文所据底本《魏郑公文集》、《魏郑公诗集》、《魏郑公谏录》、《魏郑公谏续录》，均据《畿辅丛书》。因无其他版本对照，未作校勘。《群书治要》以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日本尾张藩刊本校注时简称作“日刊本”为底本，对其中明显讹误依据唐以前古籍善本作了改正，每卷（篇）后出“校注”。“魏征谏言”均录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9月版《贞观政要》；“魏征史论录”录自中华书局1973年版《隋书》、《梁书》、《陈书》点校本。

3. 《群书治要》原篇名一律保留。对没有篇名的文段，依据魏征等当时辑录本的篇段，在“校注”中加以说明。对原书中的夹注，一律用中括弧〔〕与原文区别。

4. 对原文进行断句，一律采用新式标点符号。原文中省略部分，用删节号表示。原文中通假字一般不改；异体字尽可能改为现今通用字，但对于个别易引起误解者则不作改动。

5. 对于《群书治要》中每部书根据考证成书年代、特征、内涵及其形成流传的历史，以及对于现实的意义，写成“说明”冠于每部书之首，有的每篇文章之前也加“说明”，概述基本内容，以为导读之用。

总 目 录

魏征谏言·····	1
魏郑公文集·····	87
魏郑公诗集·····	133
魏郑公谏录·····	141
魏郑公谏续录·····	199
魏征史论录·····	209
群书治要·····	261
附 录·····	1080
魏征年表·····	1080
编后记·····	1089

魏
征
諫
言

